

刘鹗玺印、封泥鉴藏考论

贺文荣

内容提要:刘鹗的甲骨、陶文、封泥、玺印等多项收藏都极为丰富,他的藏品著录与研究在多项领域都处于开创者地位和领先水平。笔者从刘鹗日记中梳理出他的玺印、封泥鉴藏诸多历史事实与细节,涉及藏品来源、藏品内容、收藏过程、收藏费资、印章鉴定、结集发行等多项内容。现发现《铁云藏印》的版本有五种。刘鹗的玺印、封泥鉴藏有助于他对“三代文字”的考释与体系建构;他在“周印”“秦印”的印式判定和封泥的功用、称谓等方面都有重要的学术贡献。刘鹗的鉴藏观念受到“太谷学派”的“教养天下”思想的影响;同时,受儒、释、道等诸多思想的影响,他在鉴藏观念上还表现出一种“矛盾的丰富”和“投入的超脱”状态。

关键词:刘鹗 玺印 封泥 鉴藏

刘鹗(1857—1909),初名梦鹏,字云博、笈湍,谱名震远,后来自己改名为“鹗”,字铁云,又字公钩。斋号有半瓦镫斋、五十瓦镫斋、抱残守缺斋等。刘鹗是清代后期著名的鉴藏家,他在甲骨、陶文、封泥、玺印、泉货等多方面都处于开创者地位,做出了卓越的贡献。下面从他的玺印与封泥收藏实况、《铁云藏印》的版本与内容、学术贡献与重要观点和鉴藏观念四方面做出系统的考证与论述。

一、《抱残守缺斋日记》所见刘铁云印章、封泥鉴藏实况

“抱残守缺斋”是刘鹗的斋号之一,此斋号在《铁云遗印谱》《铁云碑帖题跋》和《壬寅日记》等上使用过。刘鹗日记现存“壬寅”“乙巳”“戊申”三年的手稿,“辛丑日记”原件不存,现残存约一万字的文字。2018年6月中西书局将刘鹗“壬寅”“乙巳”“戊申”三年日记手稿影印并附以“辛丑日记”文字约一万字结集出版,书名为《抱残守缺斋日记》。此本日记尽管只收录了刘鹗四年的个人记录,但其中有不少关于他玺印和封泥收藏的记录。以日记为主要依据,再结合其他文献,我们可以了解到刘鹗玺印、封泥收藏的多方面情况,如藏品来源、藏品内容、收藏过程、收藏费资、印章鉴定、参考资料,等等。

刘鹗收藏印章的来源,应该是多方面的,《壬寅日记》五月十九日:“论古又送《嵩山三阙》来看,古气盎然,殊可爱也。澄云阁送汉印三本来,索价三千五百金。”^[1]依据这则记录,我

[1] 刘鹗著、刘德隆编:《抱残守缺斋日记》,中西书局2018年版,第74页。

们很难断定刘鹗当天是否买入印章，因为这里说“汉印三本”，并未说汉印多方，另外只说索价三千五百金，没说刘鹗买了没有；但结合下文的印章价格来看，当时的实际情况可能是：为了方便，澄云阁先拿来了钤印的图录让刘鹗过目，而“三千五百金”正是这批古印的报价。

从日记来看，刘鹗收藏的印章与封泥，最主要的一部分来自王懿荣的藏品。庚子（1900）国难，八国联军攻入北京，光绪帝和慈禧出逃，王懿荣自尽殉国，此后他的藏品渐渐散失。这部分藏品正是通过王懿荣的儿子王翰甫之手进入刘鹗的宝库的。《壬寅日记》六月初八记录了刘鹗计划从王翰甫处购砖瓦、泥封，日记写道：“……王端士来谈，翰甫砖瓦、泥封有人出三百元，予拟购之。”^[1]本月的四则日记很完整地记录了刘鹗与王翰甫很重要的一批古物交易过程：

六月初十日：

晴。早起甚晏，急吃饭。至王翰甫处看其秦、汉印五百余方，又瓦头七十余件。大约明日去可以看其古钱矣。^[2]

六月十一日：

早起往翰甫处议汉印，竟不能就。索其古钱，吝不与看，意在印、瓦二事，售二千金也。^[3]

六月十二日：

子谷、予迂道翰甫家，议定汉印六百方，千二百金。予携回观之。至子谷处吃午饭后，申刻复往义署，晤谈后即归寓。检点古印，可用者仅三百五十七方，价未免太昂矣。^[4]

六月十三日：

午前雨，午后晴，本日请客。易实甫先到，次子衡，次仲丹。三点入座，哲甫方到。半阑翰甫到。饭后与翰甫议定汉印、瓦头、古钱三项共二千金。当偕翰甫入城取回，检点古钱竟夕。虽至难得之泉俱无，所有者亦颇富矣。^[5]

这次的收藏交易发生在壬寅（1902）六月，包括印章、瓦当、古钱三项，其中有印章五六百方，费资“二千金”的交易从六月十日到十三日四天就达成了，而且在这四天内，刘鹗几乎每天都与王翰甫有接触，我们似乎能感觉到刘鹗对这些藏品是很关注且热切期待拥有的。《壬寅日记》七

[1] 刘鹗著、刘德隆编：《抱残守缺斋日记》，中西书局2018年版，第87页。

[2] 刘鹗著、刘德隆编：《抱残守缺斋日记》，中西书局2018年版，第85—86页。

[3] 刘鹗著、刘德隆编：《抱残守缺斋日记》，中西书局2018年版，第86—87页。

[4] 刘鹗著、刘德隆编：《抱残守缺斋日记》，中西书局2018年版，第87—88页。

[5] 刘鹗著、刘德隆编：《抱残守缺斋日记》，中西书局2018年版，第88页。

月五日：“阴。午后至子谷处，因翰甫之债本日到期，乃由子谷暂挪千金付之。”^[1]从时间和金额来看，几乎可以确定这则日记所记录的“债”，应该就是六月份那笔交易的余款。可见刘鹗当时手头上现金并不宽裕，当时这笔余款是由子谷垫付的。

《壬寅日记》六月二十六日、十月二十日还有关于刘鹗所鉴藏印章来源的两则记录：

六月二十六日：

晴。午前，张次祥来送汉印，每钮以纸捻，甚精致可爱。^[2]

十月二十日：

已刻，潍县赵执斋来，携龟版、汉印各一匣。印计七百余方，又太和大造像一区、秦权一枚。龟板颇有大家者。^[3]

这两则虽都未记录最终入手与否，但据刘鹗的一位孙子刘蕙荪所言，刘鹗所藏古印中应该有相当大一部分是托赵执斋等人代收的，刘蕙荪说：“铁云先生既在北京得到王懿荣旧藏钤印五百余方，又先后由赵执斋等人代收了数百方。”^[4]

另外，据刘德隆、刘瑀合编的《刘鹗年谱长编》，庚子劫后清内府及王侯府邸、世家大族所藏古物有一部分流散于市肆、民间，刘鹗当时除购得一些宋元善本书籍外，所购古器物中有“汉赤泉侯印”“夷陵长印”。^[5]

刘鹗所收藏封泥的来源，有一部分来自王懿荣的收藏；另外，山东临淄刘家寨所出土者应该也是一大宗。从清代后期到民国时期，全国陆续出土的封泥中临淄刘家寨出土的数量为最大。《罗振玉年谱》光绪二十六年（1900）：“于刘铁云许见山见山左临淄新出土封泥，劝铁云传拓于所辑《铁云藏印》之后。”^[6]从《抱残守缺斋日记》中我们还可以发现刘鹗有关古印、封泥审定、研究、赏玩的日常记录。《壬寅日记》有三条这样的文字：

六月十四日：

薄阴，不及九十度而甚燥。早起摹学古泉而原君锡至，与之审定铜印。^[7]

六月十八日：

[1] 刘鹗著、刘德隆编：《抱残守缺斋日记》，中西书局2018年版，第109页。

[2] 刘鹗著、刘德隆编：《抱残守缺斋日记》，中西书局2018年版，第98页。

[3] 刘鹗著、刘德隆编：《抱残守缺斋日记》，中西书局2018年版，第161页。

[4] 刘德隆、朱禧、刘德平著：《刘鹗小传》，天津人民出版社1987年版，第129页。

[5] 刘德隆、刘瑀编著：《刘鹗年谱长编》，上海交通大学出版社2019年版，第389页。

[6] 罗继祖述辑、罗昌霖校补：《罗振玉年谱》，台北文史哲出版社1986年版，第22页。

[7] 刘鹗著、刘德隆编：《抱残守缺斋日记》，中西书局2018年版，第88—89页。

晚读古印，其用笔之妙，有在钟鼎之上者，决为周印无疑，世以秦印目之，诬矣。^[1]

八月十四日：

夜检泥封一过，颇有精者。因查各家所藏官印皆不能多也。^[2]

这些日记文字将一位玺印鉴藏家生动翔实的日常状态在我们眼前勾勒出来了。其中六月十八日日记中的“周印”“秦印”印式之辨涉及明清印学史一个很重要的论题，具有很高的学术意义，下文再详论。

就印章收藏来说，对于古印、封泥实物的鉴定、鉴赏与收藏当然是核心部分，同时“鉴”“藏”“赏”往往是三位一体的；一个鉴藏家眼力和学术功夫并不一定全来自实物品鉴，对印谱、印学专著的研读也可视为印章鉴藏的自然延伸。我们看以下五则日记文字。

《壬寅日记》三月二十三日：

因论古约看书籍，取《十六长乐堂金石》一部，又《吴平斋印谱》一部以归。^[3]

六月二十八日：

申刻至义善源、宝聚成两处。后至琉璃厂，遇于蕃于论古。取《漆园印型》及《二百兰亭斋印存》以归。^[4]

八月二十五日：

晴，暖。赴王汉辅家，取拓片并印谱以归。大概同时人所藏，但聚之不易耳。一一检阅，手足酸痛。^[5]

八月二十八日：

……潘文勤所藏《王孙遣钟》，孝公求之数年得其半同，予以其半赠之，亦一快也。《簠斋古玺》拓本，原价十两。^[6]

[1] 刘鹗著、刘德隆编：《抱残守缺斋日记》，中西书局2018年版，第91页。

[2] 刘鹗著、刘德隆编：《抱残守缺斋日记》，中西书局2018年版，第132—133页。

[3] 刘鹗著、刘德隆编：《抱残守缺斋日记》，中西书局2018年版，第43页。

[4] 刘鹗著、刘德隆编：《抱残守缺斋日记》，中西书局2018年版，第100—101页。

[5] 刘鹗著、刘德隆编：《抱残守缺斋日记》，中西书局2018年版，第138页。

[6] 刘鹗著、刘德隆编：《抱残守缺斋日记》，中西书局2018年版，第140页。

九月初十日:

……夜考《长安获古编》金元印数事。^[1]

十月初五日:

晴。午前，还琉璃厂账目。赵平甫来，买汲古阁《八唐人诗集》一部、《篆学丛书》一部、《金石屑》一部。^[2]

壬寅(1902)三月二十三日日记中提到的“吴平斋”即清代道光、咸丰年间的鉴藏家吴云，吴云曾将自己所藏古玺印铃盖辑录，先后成《二百兰亭斋古铜印存》和《两壘轩印考漫存》两部印谱，吴云又著有《二百兰亭斋古印考藏》六卷。此处所说的《吴平斋印谱》应该不是准确的名称，不知是吴云所辑印谱中的哪一部？但不管是哪一部，都有很高的学术价值。壬寅六月二十八日日记中提到的《漆园印型》，是大约1660年庄罔生辑成的印学专著，又名《宝书堂印型》，共十三卷。八月二十八日日记中提到的《篋斋古玺》是清代著名收藏家陈介祺所辑的印谱。九月初十日提到的《长安获古编》是清代刘喜海所收藏古物的图录，虽非印学专著，但除青铜器外还涉及印章、封泥的鉴藏；1905年刘鹗还出过此书的补刻本。壬寅十月初五日日记提到的《篆学丛书》又名《篆学琐言》，是清代顾湘辑录自唐代至清代三十余种印论而成的印学理论集。另外，《抱残守缺斋日记》中还多次提到《说文古籀补》，这也是刘鹗经常参阅的一部工具书，可以推想到，刘鹗在印文释读与考证时经常会用到它。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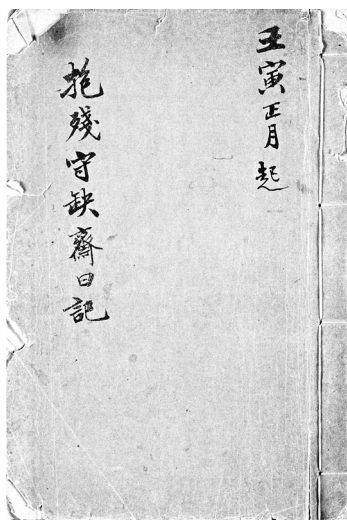


图1 《抱残守缺斋日记》之《壬寅日记》封面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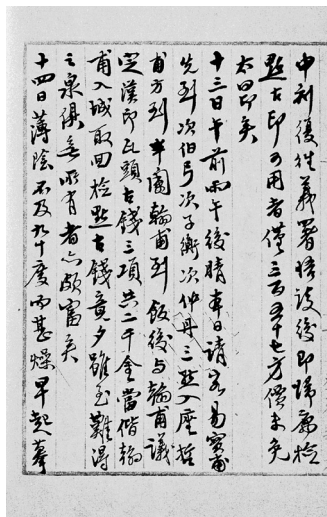


图2 《抱残守缺斋日记》之《壬寅日记》选页

[1] 刘鹗著、刘德隆编：《抱残守缺斋日记》，中西书局2018年版，第144页。

[2] 刘鹗著、刘德隆编：《抱残守缺斋日记》，中西书局2018年版，第155页。

刘鹗所藏的数千方古印后来流向如何？据刘蕙荪先生讲，刘鹗所藏古印后来全部归端方所有。他在《铁云先生年谱长编》中写道：

铁云先生既在北京得到王懿荣旧藏钤印五百余方，又先后由赵执斋等人代收了数百方。在印行《藏陶》同时，选印《铁云藏印》共一至四集。但因不是石印，而是以原印由家中塾师汪剑农闲时钤盖，共只印了百十部，所以流传极少。后来全部藏印让归端午桥（方），端方又编为《陶斋藏印》，内容大致相同。所以家准生兄说：“印有正书局所印之《陶斋藏印》。”蒋逸雪先生怀疑说：“岂鹗所藏器物，后归端方，端方乃并鹗之著述而窃取之耶？”其实两部书是一批铜印，并非端方窃书。^[1]

带着上面的说法，笔者将福建人民出版社影印的端方《匋斋藏印》四集与《铁云藏印初集》《铁云藏印续集》和《铁云藏印》（官印）比对，竟发现几乎没有重复者。因此笔者推测：《匋斋藏印》或许与《铁云藏印》的“四集本”有交集，或基本相同（《铁云藏印》“四集本”的介绍见下文）；《铁云藏印初集》《铁云藏印续集》《铁云藏印》（官印）可能与《铁云藏印》“四集本”是并列关系，后者不包括前三者的内容。目前尚未见到“四集本”，此推论待考。

二、《铁云藏印》的版本、内容与“铁云藏泥封”的辑录与印行

据《刘鹗年谱长编》载：“（1900年）开始在北京搜寻古物字画等，已得封泥、玺印等。开始考虑编辑《铁云藏印》。并曾以所收藏之封泥、印玺示于罗振玉。”^[2]此书同时认为，《铁云藏印初集》《铁云藏印·续集》成书于1903年，《铁云藏印》（一至四集）、《铁云藏印》（官印类）大概的成书时间皆为1904年。

《铁云藏印》有多个版本，情况较为复杂，刘德隆整理的《刘鹗集》中做了较为详细的考证，现再结合笔者掌握的资料，做一些补充并进行重新梳理，列述如下：

（一）“初集、续集本”

即《铁云藏印初集》和《铁云藏印续集》。

《铁云藏印初集》共10册，无释文。笔者见到过西泠印社藏本和天津图书馆藏本。西泠印社本内页版框为黄色梅花纹，全框竖17.4厘米，横12.2厘米，版心左上端有篆书“铁云藏印初集”六字。此集收官印104方，古玺89方，私印296方，共收489印。此本为张鲁庵先生旧藏，后捐给西泠印社。天津图书馆藏本，版框为黑色细线，版框宽10.2厘米，高13.7厘米，版心无鱼尾，书页正面版框左上署篆书“铁云藏印初集”六字，页背右下署篆书“抱残守缺斋”五字。印为朱砂原钤，一页一印，背页空白，印无释文，钤印387方。此谱为周叔弢先生旧藏。《刘鹗年谱长编》作者刘德隆先生所见的“初集”本又与以上两种版本有所不同，他所见的版本：书名“铁云藏印初集”（篆字），钤

[1] 刘蕙荪著：《铁云先生年谱》，齐鲁书社1982年版，第111—112页。

[2] 刘德隆、刘瑀编著：《刘鹗年谱长编》，上海交通大学出版社2019年版，第383页。

于“抱残守缺斋”(篆字)稿笺上。全印谱十册,钤印421方,无释文。分别为第一册50面、50方,第二册40面、80方,第三册37面、45方,第三册34面、34方,第五册33面、33方,第六册40面、40方,第七册40面、40方,第八册36面、36方,第九册37面、37方,第十册40面、40方。其中第三册、第四册、第七册,有圆形印18方。第二册有菱形印1方。第二册有组印两组,各5方。^[1]

《铁云藏印续集》共8册,西泠印社有藏。西泠印社藏本版框为粗线墨刷,框高14.5厘米,宽9.4厘米。版框正面上方印老宋体“铁云藏印续集”六字,背页下方印“抱残守缺斋金石”七字。封面无题签,按古玺、官印、私印编次,无释文,收官印42方,古玺116方,私印371方,共收印529方。

(二) “四集本”

据《松荫轩藏印目录(初稿)》:“《铁云藏印》四集即四十八册。”初集十册,二集十二册,三集十四册,四集十二册,计二千方。这可以称为“四集本”。2021年9月10日日本雅宝秋拍中有《铁云藏印》(初集、二集、三集、四集)原钤本,即为“四集本”,但每集册数等未必与“松荫轩”所记完全相合。西泠印社2020年春季拍卖会曾拍《铁云藏印三集》,此集也是“四集本”散落出的一本。

(三) “两册本”

20世纪60年代钱杏邨“得《铁云藏印》两册”。上海大众2004秋季大型拍卖会有“《铁云藏印》”二册。北京“中国嘉士德第66期周末拍卖”有7000多件中国书画拍卖,其中“两册《铁云藏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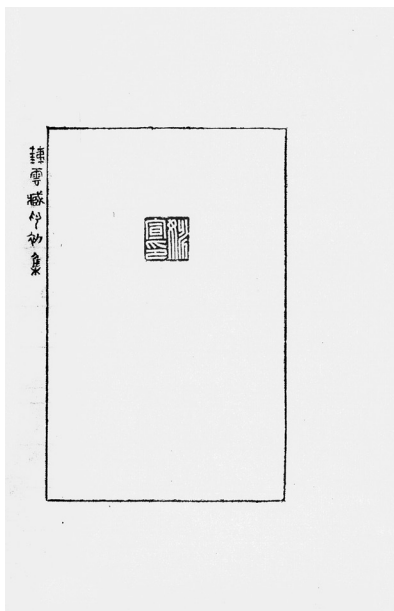


图3 天津图书馆藏《铁云藏印初集》选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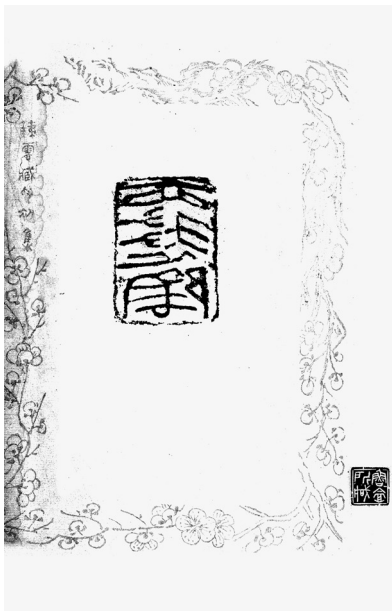


图4 西泠印社藏《铁云藏印初集》选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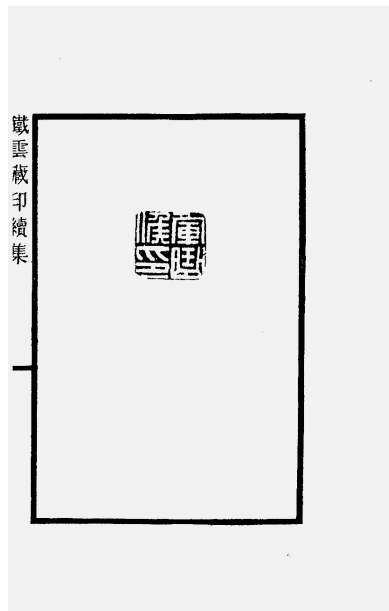


图5 西泠印社藏《铁云藏印续集》选页

[1] 刘德隆、刘瑀编著:《刘鹗年谱长编》,上海交通大学出版社2019年版,第535页。

印》合集”。

（四）“四册本”

《铁云藏印》还存在一种装订成四册的版本。这可以称为“四册本”。

（五）“分类本”

“南京博物院又存《铁云藏印（官印本）》一册，为从无记录者。这可以称为‘分类本’。封面隶书题签‘铁云藏印’四字下有小字‘官印类’。印36方钤于‘抱残守缺斋金石’专印笺纸。此册用笺上有‘铁云藏印初集’六字，其字体似现在的印刷体，与本书所收8册本《铁云藏印续集》相同，与本书所收《铁云藏印初集》用笺之篆字不同。”^[1]

刘鹗所藏封泥没有单独结集出版，而是附在《铁云藏陶》一书的后面。光绪三十年（1904）刘鹗刊行《铁云藏陶》作为“抱残守缺斋藏三代文字之二”。《铁云藏陶》共四册，第一至第三册拓印所藏陶器铭文，有刘鹗自序。第四册拓印刘鹗所藏封泥，有吴昌绶序和刘鹗自序。共收封泥165方，日本人山本由丁题签，由有正书局出版。1988年江苏广陵古籍刻印社根据1904年的石印本，重新影印出版《铁云藏陶》。2003年中国科技大学校长朱清时在日本购得日本影印之《铁云藏陶》并请中国社会科学院李学勤先生释文。

三、刘鹗玺印、封泥鉴藏方面的学术贡献

考藏刘鹗在玺印、封泥鉴藏方面的学术贡献，要将其还原到收藏史和玺印学术史的历史链条中，并结合19世纪末、20世纪初的具体文化境况，如此才能凸显他的先驱者身份和启蒙者的作用。因为也许在现在看来常识性的认知和观点，在当时却具有开创性和启蒙性。

究心三代，溯源篆籀，振扬国学。刘鹗收藏古代玺印和封泥，在文字学研究方面表现出清醒而自觉的学术意识。在刘鹗的心里，钟鼎彝器款识文字与甲骨文、陶文、古玺印文构成一个研究三代文字的体系，而三代文字正是通向三代历史文化的一条路。因此，光绪二十九年（1903）他刊行《铁云藏龟》时，将其命名为“抱残守缺斋所藏三代文字之一”；接着于光绪三十年（1904）刊行《铁云藏陶》时则命其为“抱残守缺斋所藏三代文字之二”。刘鹗在《铁云藏龟》《铁云藏陶》出版广告中说：“士生三千年后而欲上窥三代文字难矣！……近来新学日明，旧学将坠，愿与二三同志抱残守缺，以待将来。故出敝藏古文，拓付石印。”^[2]刘鹗当时所藏封泥中虽然没有秦以前的，但他把封泥和甲骨、陶文看成一个体系，仍从与三代文字相比较角度看待，他说：“虽非三代文字，然其中官名多为史籍所不载，殆亦考古者之一助云。”^[3]后来我们见到不少先秦封泥，可见当时刘鹗试图用甲骨文、陶文、货币文、玺印文、封泥文等共同建构“三代文字”体系的想法具有超越时代的先见之明。

[1] 刘德隆、刘瑀编著：《刘鹗年谱长编》，上海交通大学出版社2019年版，第535页。

[2] 刘德隆整理：《刘鹗集》（上册），吉林文史出版社2007年版，第669页。

[3] 江苏广陵古籍刻印社编：《铁云藏陶》，江苏广陵古籍刻印社1998年版，第98页。

在玺印断代、分类上刘鹗也做出了可贵实践，提出了重要见解。《抱残守缺斋日记》壬寅日记六月十八日：“晚读古印，其用笔之妙，有在钟鼎之上者，决为周印无疑，世以秦印目之，诬矣。”^[1]这一条看似平淡无奇的日记，实际上涉及明清印章鉴定方面一个重要问题，即秦印与先秦印章印式特点的判定问题。这一问题在明清印学理论著作的论述、印谱编撰和印人的取法与主张等多方面都表现出一致的倾向：那就是对秦印和先秦印式表现出夹缠不清的认知和判断。明代甘旸的《集古印证》《集古印谱》对古玺印和秦印没有明确的区分。明清以来，印人对于秦印的认知是模糊笼统的，经常将战国古玺判为秦印。清代夏一驹的《古印考略》、孙光祖的《古今印制》误将战国小玺称为秦玺，将秦印的判定标准设为两条，一为“小方阳文”，一为“多边阔”。这是将三晋古玺与秦印混淆了。沙孟海先生针对明清人对秦印的误读作了清晰的辨析，他曾于1966年在香港《大公报》发表《论秦印》一文，1983年《书法研究》第三期全文专载此文，文中论述道：

过去人们称为秦印的有两种，其一是朱文小玺，即所谓“阔边碎朱文”；其一是无边栏有界格的白文印。……但今天还有人沿用“秦玺汉印”，还认为朱文小玺为“秦印”，那是必须纠正的。……第二种被认为秦印的是有边栏有界格的白文印。这一认识基本正确。^[2]

实际上沙孟海先生提及的第二种对于秦印正确的认识，也是到了清后期刘鹗、陈介祺、吴大澂、罗振玉等少数人那里才逐步得到清晰而准确的认知。陈介祺在1878年致《吴大澂书》中明确指出明清人对秦印与先秦印的认知混淆，他说：“前人谓之秦印，不知是三代，今多见，亦似六国文字。”^[3]陈介祺在后来的《封泥考略》中对秦印判定标准的判断就更清晰了，他概括为：职官地理符合秦制，印面有界格和文字同石鼓、小篆。可见直到19世纪末，对秦印和先秦古玺区分才逐步清晰起来，这个学术课题是由刘鹗、陈介祺等少数几位既富有收藏又饱学博通的鉴藏家完成的。对于玺印的分类研究，刘鹗也做了一些工作，如上文所述，《铁云藏印续集》8册，从西泠印社藏本可以发现他在按古玺、官印、私印编次。《铁云藏印》中有一册以“官印”为专题的版本，南京博物院收藏有此本。如果不是获罪被执而流放新疆，以致以53岁的年龄病发身殒，可以想见玺印分类编辑的工作刘鹗应该会继续做下去，也会做得更深入，更细致。

对封泥的功用判定和“正名”上，刘鹗也有重要的贡献。现在我们称“封泥”，似乎有一种服从习惯称呼的惰性。要为封泥正名，就要先追究一下清人对封泥功用的认知。道光二十二年（1842）吴荣光辑《筠清馆金石》，摹出“刚弭右尉”等六枚封泥。此文序文中记载了道光二年（1822）四川人挖山药时发现封泥，并将其卖至京师的事。但当时人却不明此物的用途，将其称为“印范子”。后来刘喜海的《长安获古编》著录当时30枚关中出土的封泥，书中图旁有隶书标题“封泥”字样。据刘鹗日记，他曾多次读此书，后来还从王翰甫处买得王懿荣旧藏此书的刻版，补刻了一些标题后再版。那么，刘鹗对于“封泥”之名肯定是熟悉的。但是1904年刘鹗在出版他的《铁云藏陶》时明确用了“泥封”一名，且很清晰准确地说明其用途，他说：“泥封者，古人封苞

[1] 刘鹗著、刘德隆编：《抱残守缺斋日记》，中西书局2018年版，第91页。

[2] 《书法研究》1983年第3期，第1—2页。

[3] 陈介祺著、陈继揆整理：《秦前文字之语》，齐鲁书社1991年版，第319页。

直之泥而加印者也，封背麻丝黏着往往可见，在昔不见于著录。自吴荷屋《筠清馆金石》始录六枚，称为印范，误以为铸印之范也。”^[1]刘鹗说的“封苞直之泥”才应称为“封泥”，而在泥上加印后即成为“泥封”。秦汉以来史料是有明确的记载；尤其是“封泥筒”的出土更证明这点。同年陈介祺、吴式芬的《封泥考略》问世，却依然用“封泥”为名；1913年罗振玉、王维的《齐鲁封泥集存》一书印行，依然用了“封泥”的名称，随后多种著录、著作都习惯性地沿用了“封泥”的名称，极少有人关注“封泥”的命名问题。2019年12月周晓鹿先生在《西泠艺丛》发表《“泥封”“封泥”称谓辨》一文，对此问题做了全面而清晰的梳理和论证。周先生的学术论证使我们可以发现，“泥封”和“封泥”尽管相关，但它们各自有着明确的内涵指向和文物归属，只有将两个称谓明晰化，才有利于文物制度的研究和学术表述的准确。由此，我们可以发现刘鹗作为封泥研究的先行者见地颇高，其学术贡献不容忽视。

四、刘鹗鉴藏观念寻绎

如果我们把刘鹗玺印鉴藏与他的藏龟、藏陶和藏货作为统一的整体，再结合他的学术思想与人生观念，我们会发现他的鉴藏观念不但具有深入的思想内涵，且表现出独特个性。鉴藏观念研究是我们研究古代具有士人和朝廷官员身份的收藏家时一个重要的课题，这个课题应该受到重视。

刘鹗的古物鉴藏有一个明显的特点，那就是他非常重视藏品的结集印行，且做得很及时，以至于在多项领域都处于开创和领先地位。就甲骨文来说，一般都公认王懿荣为发现甲骨第一人，但是由于刘鹗的《铁云藏龟》是甲骨文史上第一本藏品著录，所以学界不少学者也称刘鹗为“甲骨第一人”。而他的《铁云藏陶》也是我国著录和研究古陶文的第一本著作。刘鹗非常及时地刊行个人藏品，当然原因是多方面的，但一定与他“以天下为己任”的思想密切相关。他曾在《铁云藏龟》《铁云藏陶》出版广告中感叹收藏家不肯轻易公示自己藏品的情况。而他自己的态度则相反，他在《铁云藏龟》序中写道：“龟板文字极浅细，又脆薄易碎，拓墨极难。友人闻余获此异品，多向索拓本，苦无以应。然斯实三代真古文，亟当谋广其传，故半载之力，精拓千片，付诸石印，以公同好。”^[2]在《铁云藏陶》自序中写道：“可见匋之为器虽微，而古人作之正之者皆圣贤之资，宜其文字足重也。海内名家尚未显诸著录。于是选择敝藏属直隶张茂细心精拓，得五百余片，更益以旧藏陈寿卿家拓本七十余纸并付石印，是为抱残守缺斋三代文字之二，世之宏博君子欲考篆籀之原者，庶有取焉。计海内收藏家所得必数倍于此，吾其为嚆矢也夫。”^[3]《铁云藏印》没有序跋，但在玺印方面他的这种主动意愿与天下共享的心意与前面所述一定是一致的。虽然，任何一个想将自己收藏公诸天下以供大家研究的人都多少有类似的想法，但如果我们结合刘鹗的思想体系考察其收藏观念，我们就会有更多、更深的感悟。

追究其思想与学术根基，刘鹗一生归止“太谷学派”第二代传人李光听（李龙川），他曾于20岁时在扬州游历，拜见过李光听，一见倾心，一生拜服。据说在“谒师礼”上李光听给予刘鹗“超

[1] 江苏广陵古籍刻印社编：《铁云藏陶》，江苏广陵古籍刻印社1998年版，第97页。

[2] 刘德隆整理：《刘鹗集》（下册），吉林文史出版社2007年版，第28页。

[3] 江苏广陵古籍刻印社编：《铁云藏陶》，江苏广陵古籍刻印社1998年版，第3页。

凡人圣”的训言。太谷学派主张“富而后教”，以“养民”为本。刘鹗秉持这一思想，一生都在践行。他在光绪二十八年（1902）致函黄葆年时说：

……弟既深自信以能窥见公之一斑，故谤满天下不觉稍损，誉言满天下不觉稍益，惟一事不合龙川之法与公所为，辄怏怏终夜不寐，改之而后安于心，此又不足为外人道也。……今日国之大病，在民失其养，各国以盘剥为宗，朝廷以朘削为事，民不堪矣。……圣功大纲，不外教、养两途，公以教天下为已任，弟以养天下为已任。各竭心力，互相扶掖为之。^[1]

在刘鹗心中，处处以太谷学派师长为榜样，以致言行与老师的教导不相合时，心里就很不安。将自己的收藏品印于楮素，流通天下，好像与此一段话的关系不是很密切；刘鹗“养民”的主张主要表现在兴办实业、治河救民、“买太仓粟”救灾民等方面；但印书既关乎“教”，又关乎“养”，是一种以书供养天下的行为，最起码与“以天下为己任”的拳拳之情密切相关，有此大胸怀、大格局岂会有囤奇待沽、秘不示人的心理。

刘鹗的老师李光听在各地讲学时，多次给弟子们强调儒家“立德、立功、立言”的“三不朽”传统。严薇青在《刘鹗和太谷学派》中说：“根据太谷学派的解释，不仅功在社会、民间是立功，就是专攻学术，献身文艺，同样是也是立功。……所以太谷弟子在做事业和做学问时，多是勇往直前，百折不挠，不畏缩，不颓丧，在遇到需要牺牲时，也不毫不犹豫。……刘鹗在庚子战役中自动携款进京，办理平糶、放赈等，做出种种一般人所不敢设想的事，而从未考虑其后果和得失；在学术方面甚至被诬陷；遣戍新疆后，还致力于中医学的研究，也是为了这个信念。”^[2]读了这一段话，就不难理解刘鹗为什么在甲骨学、陶文、封泥、泉货等多项鉴藏与著作印行方面都成为先行者甚至是首创者了。

当然，刘鹗的收藏观念也不是这么简单的，其具体表现上还呈现出一种“矛盾的丰富”和“投入的超脱”，这与他的思想以“太谷学派”为核心和根基，又呈现出儒、释、道传统文化与西方新学相融合的状态有关。我们先看两则《壬寅日记》：

七月十三日：

午刻论古来借《东海庙碑》及《嵩山三阙》，为沈子培代借也。接于继美信，寓貽德里第二巷第一家。……信愿以股票易帖，因得《圣教序》一本，出鄂本上远甚。王孟津比之于帖中之帝，信矣。又宋拓六种：《九成》《皇甫》《岳麓》《道因》各一，《智永千文》二，狂喜不禁。楚生赞曰：“可谓穷得阔极了，阔得穷极了。”二语至当。^[3]

七月二十八日：

[1] 刘德隆整理：《刘鹗集》（上册），吉林文史出版社2007年版，第754页。

[2] 刘德隆、朱禧、刘德平编：《刘鹗及老残游记资料》，四川人民出版社1985年版，第641页。

[3] 刘鹗著、刘德隆编：《抱残守缺斋日记》，中西书局2018年版，第114—115页。

阴，微雨数阵。镇日无一事，亦无一人来。清闲静逸，于是临帖数纸，读书数篇。觉此乐境得未曾有。盖人生世间高寿不过七八十岁，少年后志于功名，老来耳目手足俱不适用，中间三四十年家室之累、衣食之资，日奔走风尘以求锱铢之利而不可必得，况有余资搜集古人书籍、金石之美，岂不难哉！即有余资，而此类者非若黄金、白玉、越锦、吴绫之可立致也。既集之矣，人事之烦搅、家室之丛杂，自朝至于深夜，又无寸晷之闲俾得摩挲而玩赏之。然则如今日者，求之于一生之中，不知有几次也。悲哉！予有黄金左田册页一本，书、画各四叶，自庚子年得，至今未重寓目。今日展视，若故友重逢，不胜离合之感。然则往日之极力搜罗至负重债而不顾者，所为何哉？誓自今日为始，苟非动心怵魄之品，一概禁止，既惜费，又惜福也。^[1]

第一段日记中的“可谓穷得阔极了，阔得穷极了”一句虽非由他本人之口说出，但从刘鹗对此句的激赏态度，可见他在因收藏过分费钱，以至于常常陷入财政拮据的困境面前是何等的洒脱。他将“穷”与“富”参出了禅味，参到了“不一也不异”的境界！第二段日记感叹人生易逝、奇物难得，即使有幸拥有，迫于人生诸种事务，也难得有寓目骋心的闲暇和心境。进则喟叹自己在收藏上投入太多了，下决心以后若非上等精品，绝不出手，说这是“既惜费，又惜福也”。这一段表现刘鹗收藏过程中思想感情既丰富又矛盾的状态。但是因为刘鹗有足够丰富、深刻的思想，使他最终能从多种矛盾中超脱出来，呈现出超然洒脱、心定神闲的状态。他在《述怀》一诗中写道：“……孔子号时中，知时无中偏。万事譬诸物，吾道为之权。得权识轻重，处如循自然。因物以付物，谁为任功愆……”^[2]这几句诗很有哲学高度，写出了他对待事与物的超然态度。对于一个鉴藏家来说，古物一定是心之所向、情之所钟的对象，用情越深、用心越专就会出现“人为物役”的状态，但是刘鹗的思想是广博深厚的，他参到了这层关系，并采取了一种从容达观的态度。这让人自然想起苏东坡写的《宝绘堂记》。《宝绘堂记》是写给当时极富书画收藏的王晋卿的，此文一开篇就写道：“君子可以寓意于物，而不可留意于物。寓意于物，虽微物足以为乐，虽尤物不足以为病。留意于物，虽微物足以为病，虽尤物足以为乐。”^[3]东坡先生的看法可以与铁云先生的观点可相参看。如是，我们从鉴藏观的角度考察鉴藏家，可以引出很有意义的课题，还可以从具体的门类鉴藏研究延伸到大的收藏文化。

（作者系西安美术学院副教授、硕士研究生导师，终南印社社员）

[1] 刘鹗著、刘德隆编：《抱残守缺斋日记》，中西书局2018年版，第123页。

[2] 刘德隆整理：《刘鹗集》（上册），吉林文史出版社2007年版，第561页。

[3] 苏轼著，曾枣庄、舒大刚主编：《苏东坡全集》，中华书局2021年版，第2867页。